

父亲二三事

林海

父亲离开我已整整三年，今年注定又要经历一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了。

三年前，父亲不慎摔倒，卧床一年有余。一天早晨，我喂过父亲早饭后，发现父亲眼角淌下两行热泪，眼里闪动着求生的光亮。他的眼神和泪水一下子触动了我心灵深处的那根神经——父亲给了我生命，可是在他弥留之际，我却无力回天，这是多么无奈、多么残忍的事情。我心如刀绞，忍不住转过身去……

父亲林亲先，1.81米的个子，浓眉大眼，四方脸，用现在人的说法，简直是酷毙了、帅呆了。上世纪60年代末，我在家乡上小学，父亲担任生产队政治队长，他的大公无私和铁面无私是出了名的。

一个秋日傍晚，夕阳西下，沉过嵩山顶，我跟几个小伙伴放学后，跑到村西“南子沟”的地瓜地里，看大人们分地瓜。他们有的在刨，有的在分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在玩耍疯闹着，满地里乱跑，跑累了，口渴了，就跑到地瓜堆里，每人拿起一个地瓜，在“地隔子”（地沿）边的青草上把土擦掉，刚要吃，正在领着社员分地瓜的父亲看见了，远远喊：“小海，你在干什么，谁让你随便吃集体的地瓜了？”他这一声喊，把正在兴头上的我们几个小孩子吓住了，我们赶紧把到了嘴边的地瓜扔进地瓜堆里。我心里很不服气，不就是一个地瓜，至于吗？

多年后，我跟父亲说起这件事，戏谑他小题大做，太过认真。他语重心长地跟我说：“小海啊，咱不能贪集体的便宜。不贪不占，咱活得踏实，等老了也心安。”

老家百年老宅沿袭先人规矩顺山而盖，九间正房后是村里从本家亲戚手里买下的房屋。20世纪80年代初，村里经常在院子里晒海参，我家两扇后窗正对着后院。

一天傍晚，我正巧在家，忽然听见后院一阵刺耳的叫声，循声望去，原来是我家大黄猫在跟一个大黑猫打架。两个家伙互不相让，大黑猫一下子跳到我家大黄猫身上，滚成一球。

我怕我家大黄猫吃亏，一个高跳到后院，迅速将大黑猫赶走，然后兴冲冲地从后窗爬进家。刚落地，恰巧父亲散工回家，见我从后窗跳进来，立刻面有愠色，“小海，你跑后院子干什么去了？”

“赶猫去了。”

“没拿海参吧？”

“没拿。”

父亲见我不高兴的样子，知道冤枉我了，赶紧陪着笑脸，说道：“千万别过去拿海参哈。大队在这里晒海参，就是对咱家人的信任，咱要对得起这个信任呀。”

父亲一辈子重情重义，重视亲情。他19岁时，就跟着在东北辽东省（后与辽宁省合并为辽宁省）担任省长秘书的本家大伯父林英离开家乡。父亲知书达理，心灵手巧，记性超群，很快被任命为四平市商业局销售科长。

回乡期间，父亲目睹了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十分振奋。恰巧当时国家大力提倡支援农村建设，父亲便辞职回到家乡长岛县嵩前村。回乡后，父亲从未忘记远在东北的大伯父一家人，每年都有书信往来。他在担任北长山乡供销公司经理期间，每逢出差时，都要带着家乡的特产去看望林英大伯父他们。大伯父每隔三五年也会携同大伯母回乡住上几日。

后来，林英大伯父病故，父亲就按照他生前的愿望，接他魂归故里。父亲生前，逢年过节都要带领我们兄弟几个为林英大伯父上坟祭奠。如今，故人不在，亲情犹存。我和弟弟每年逢年过节都会像父亲那样上山拜祭。

孤月影下，倍思亲人。父亲，夜空里那么多星星，不知哪颗是您，您可看到了家乡，看到了我思念您的眼睛！

父女战争

张凤英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让我叫他“爹”，这个很土气的称呼经常引起小伙伴们们的讥笑。可是父亲说：这是中国传统的叫法，中国人不能丢掉自己的传统。由于父亲喜欢男孩，我经常和他发生“遭遇战”。

有一年冬天，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老家，正在上学的我只能跟着父亲在单位吃饭。那天中午吃饭时，有个叔叔讲了一个黄段子，大家都哈哈大笑，我也跟着笑了。父亲突然对我大吼一声，一把夺过我的饭碗，接着是一个响亮的耳光。从此，父亲再也不让我到他单位吃饭了，他容不得自己的女儿看见和听见那些不文明的东西。

父亲是从农村出来的，他对土地的热爱是根深蒂固的。他在车站边的荒地上种了芸豆角、萝卜、白菜、谷子和土豆等作物，每到秋天，父亲就白天上班，晚上收割。我是他的帮手，收回的谷子需要用大板车往回拉。父亲在前面拉，我在后面推。看见父亲汗流浃背，我难过极了。有一天拉白菜，我鼓起勇气接过父亲的大板车拉起来，不一会儿，肩膀就火辣辣地疼，但我对自己说：今天决不能示弱，一定要让父亲知道我和男孩子一样能干。就这样我把那一车白菜拉回家。到家后，母亲掀开我的衣服一看肩膀都出血了。父亲却笑了笑说：还行，不比男孩子差！那一刻，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又流出来了。

我14岁生日那天，父亲送给我的礼物是一根竹子扁担。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：“从今天起，给家里担水的活儿就是你的了。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早就给家里担水吃了。”我试着担了半桶水，还行，没出洋相。父亲说：“慢慢来，多练习，时间久了就习惯了。”

17岁时，我已经长大了。有一天身体不适，肚子疼，趁着父亲不在家，就指挥两个妹妹抬水。没想到，两个妹妹抬水回来的时候，正赶上父亲下班回来。两个妹妹你推我搡争吵起来，故意弄得动静很大。父亲顺手拿起擀面杖打了我。我气愤之极，一口气从家里跑了出来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，打算离家出走。可是上车不一会儿，就被查票的叔叔赶下了车。无奈之下，我硬着头皮往家走。那时，天已黑了，走到离家不远的地方，忽然听见母亲和父亲吵架的声音。原来他们是出来找我的。母亲边哭边说：“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不活了。这么大的姑娘了，你一个当爹的还打她，她那么要强，要是一时想不开……”听到这里，我顿时泪流满面，冲到母亲身边，抱住母亲大哭起来。

从那以后，我认定父亲是不爱我的，想着早日离开这个家，于是当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招人的时候，我义无反顾地报名走了。到达内蒙古以后，我一直不给家里写信。父亲日夜盼着我的来信，一直盼不到，担心我出了什么事，不到一个月头发都白了。后来通过战友和同学，父亲知道了我的地址，三番五次写信给我后，我才给家里回了一封信，随信寄了40元钱。父母接到我的信和钱，双双落下了眼泪。这一切都是后来才知道的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！

后来我考上大学，离开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父亲为我很是骄傲了一阵子。他对邻居说：“一中有百十号人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只有我闺女考上了大学，那是百里挑一啊！”可是邻居大爷说：“只可惜啊，是个丫头。”我爹听了，不再言语，回来对我妈说：“闺女结婚的时候，婆家必须拿出她这几年上大学花费的钱来，不然我不是白白为婆家培养了个大学生媳妇吗？”

结果我结婚的时候，父亲真的向婆家提出了500元的彩礼钱。不巧的是，我的婆家养了一窝儿子，穷得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更何况我也不愿意要这份彩礼，就对父亲说：“谁说我出嫁以后就不是张家的人了？第一，我每月会按时寄钱回来；第二，我的儿子会跟着我姓张的。”父亲大声问：“此话当真？”我说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”从此，我每月都给父亲寄钱，儿子出生后也姓张，父亲的心里才舒服了。

在我们家我排行老大，虽然出嫁了，但我仍然承担着老大的责任，每一个弟弟妹妹结婚，我都给予资金支持，逢年过节还给父母寄礼物和钱。

2007年父亲病重，我给他寄了7000元钱。后来父亲写信对我说：“30多年了，你一直信守当初的承诺，养你这样一个女儿和养个儿子是一样的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要你做我的女儿。”看了这封信，我又像小时候一样泪如雨下。

其实，父亲在我36岁当了大学讲师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嫌弃过我是女孩了。他退休后回到太行山老家，每当收到我寄来的书，他都骄傲地对村里人说：“这是我闺女写的书，上面还写着她是咱们阜平县的人呢！”

本来，我以为对于父亲的养育之恩，我一直在努力地报答，可是在父亲病危的日子里，当我从千里之外回到故乡，看见病床上骨瘦如柴的父亲，我抱愧得无以复加。父亲病成这样，伺候父亲的都是弟弟妹妹。父亲已经走了九年了，每年父亲节的时候，我都想对父亲说，“爹，来世我还要做您的女儿！”



父亲的独轮车

林春江

在我家的后院，靠北墙倚着一辆独轮车。它是用赤红色的铁管焊接而成，中间凸起，细长的银色车辐条，沉重冰凉的车把，中间系一条土黄色的宽绳，看起来粗笨简陋，但父亲的这辆独轮车，推起了山尖般的花生苞米，推起了一家人的衣食住行。

少年时，喜欢跟着父亲去前沟薅花生。我推着小车，父亲推着大车。薅完花生，父亲领着我将饱满圆润的花生连同绿色的藤蔓，一趟趟从地里抱出来，在独轮车上整整齐齐摆放好，用粗麻绳左缠右绕。“扎箍”好车子，我在一旁紧紧地扶着，父亲提起膝盖顶牢，狠狠一勒，粗绳深深陷进花生垛的中间。我弯腰奋力提起沉重的车把，将黄绳套在脖子上，小心迈出一步，顿时，小腿肚子打颤，被压得直不起腰来。只得赶紧放下，推起我的小车。父亲笑着接过来，我尴尬地挠挠头，推着小车急走几步，来到一个下坡，我用脚趾住地面，拽着车把，身体努力后仰，食指中指勾紧车闸，在“吱嘎吱嘎”刺耳的摩擦声中，一车花生缓缓移动，好不容易蹭到山脚下，出了一身大汗。放稳小车，歇口气，见父亲还没下来，急忙往山上跑。拐过一个急弯，父亲推的独轮车缓缓而来，我跑上前，用后背顶着一车花生，慢慢往前走。父亲将车子停在平坦处，坐在地上小憩。大颗大颗的汗珠啪嗒啪嗒掉落下，砸进土里，身上的粗布衣服全被浸湿了。

那些年，家里的“国光”“北斗”苹果树刚刚结果，村里和镇里没有果品批发市场，大人们商量推着独轮车去市里售卖。我央求父亲领我一起去。父亲将独轮车的前梁系上一根粗细均匀的麻绳，打好活结递给我，拍拍我的肩膀说道：“江儿，别用蛮力，平道下坡松一松，上坡时紧一紧，腰腿发力，用肩膀拽拉，不要用手。”他温和的眼神里，满是鼓励和信任，我点点头，默默地将活结套在肩膀上。这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。捆好四筐苹果，我们上路了，一开始，一马平川，很轻松，父亲轻快地推着独轮车，麻绳松松垮垮的。

快到东厅时，遇到一段长长的斜坡，我俯下身子，黄胶鞋紧蹬地面，弓腰弯背，使劲用肩膀拽紧麻绳。三百多斤的苹果缓缓朝前移动，蓦然回首，只见父亲向前倾着身体，粗壮的胳膊青筋凸起，黝黑的脸庞上汗水如注，黄色的宽绳紧压着他的脖颈。我的眼里升腾起一层雾气，回身攥紧麻绳，拼命拽拉。好不容易抵达福山，我们再也走不动了，就在一家商场前，支起了摊。快到中午时，卖出了两筐。父亲很高兴，掏出五块钱，让我去买点吃的。捏着五块钱，往北走了五十多米，发现有卖油条的，就买了十根，跟老板要了一点儿咸菜，用油纸包着，拿了回来。

我们爷俩席地而坐，狼吞虎咽地往嘴里塞油条。父亲吃了四根，用粗大的手掌抹抹嘴巴，对我说：“我吃饱了，剩下的你都吃了吧。”饭后我倚着独轮车打盹，不一会儿，倦意上涌，沉沉睡去。醒来后，只见落日余晖，晚霞渐染。我的身上，披着父亲的粗布上衣。扭过头来，仅穿一件灰秋衣的父亲强打精神，眼睛里布满血丝，在风中等待买主。这时，走来一名身着中山服的中年人，问什么苹果，怎么卖？父亲欣喜地告诉他，中山服沉吟片刻，说道，跟我走吧。原来他是一家工厂的采购员，他全要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推着独轮车，父亲卷起一袋旱烟，美滋滋地吸着，路途漫长，橘黄色的路灯，拉长了我们的身影，我和父亲脚底生风。

十几年前，父亲买了一辆三轮摩托车，那辆独轮车光荣“下岗”了，放在后院的西北角。父亲用几块石棉瓦搭起一个简易的“帐篷”，为它遮风挡雨，它倚着墙角，默默无语。独轮车虽然风光不再，但在它身上，浸润着生活的酸甜苦辣，铭刻着难忘的经历，见证了农村的蝶变。